

# 从大运河诗歌看明清河北沿运地区经济与物产

马吉照<sup>1</sup>, 王凤丽<sup>2</sup>

(1.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 河北 秦皇岛 066100;

2.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发展研究所, 河北 石家庄 050051)

**摘要:** 明清大运河诗歌在独特的文学价值之外, 对大运河及沿岸地区的社会面貌、民俗风情等多有反映, 为后人提供了考察区域历史的宝贵资料。明清时期, 河北沿运地区小麦已成为主要农作物, 果木以枣、桃、梨最有代表性, 长芦海盐是本地区最重要的经济物产, “沧酒”既是数百年间天下闻名的特色产品, 也堪称一种文化传奇。大运河诗歌中的相关材料可与史籍相互参证, 为河北沿运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风貌描述出更为详尽、生动的历史图景。

**关键词:** 大运河; 大运河诗歌; 沧州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910(2020)03-0014-07

京杭大运河曾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同时更是一条璀璨的文化河流、诗歌之河。北上京师、南下江浙的官员、文士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各类行旅之人, 在大运河及沿岸城镇码头留下了大量诗篇。这些诗歌从行旅诗的角度看, 再现了从启程到泊舟住宿, 沿岸访友揽胜, 航行中阻风遇雨等古代水上行旅经历的方方面面, 表现了诗人们旅途的种种情感和心态, 既延续着古代行旅诗的共性和传统, 也有时代和地域的特性, 构成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 另一方面, 明清大运河诗歌也如同一幅历史长卷, 对大运河及沿岸地区的社会面貌、民俗风情、风光名胜、人文历史等也多有反映, 为后人提供了一面认识历史、考察区域文化的镜子, 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明清两代, 由于京杭大运河的沟通作用, 沿线区域南北经济交流大大加强, 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手工业也在繁荣活跃的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取得了长足进步。大运河的南运河段(临清至天津)所流经的直隶运河区域, 相对于整个运河流域而言又有其独立的特征。农业是传统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 但河北沿运地区只有南部的清河、临西(明清属山东临清州)等县由于地处黄河冲击平原, 土地垦殖率高, 属于典型的农作区, 北部明清时期属河间府管辖的大部分区域则地处海河流域下游, 地

势低洼, 多盐碱, 种植业经济不发达, 但有鱼盐之利, 沿海一带自古是重要产盐区。在作于南运河段的大运河诗歌中, 从诗人们触目所及的田园风光到城镇码头中的观察、体验, 都可以透露出经济和物产的特色, 体现出有别于其他沿运地区的地域特征。

## 一、海盐

长芦盐是整个直隶盐业的代称。长芦旧地在今河北沧州, 这一带盛产海盐, 自古是中国北方主要盐产区之一<sup>[1](P390)</sup>。海盐, 堪称是大运河河北段最有特色的物产。正如清人严遂成《沧州》诗中所言“调平盐铁论, 老少可无饥”<sup>[2](P177)</sup>, 盐作为古代重要的经济物资, 盐业经营好了, 对保障国计民生有重要意义, 明清诗人在沧州、天津一带写下的诗歌中对长芦盐生产、运销多有反映。

首先是盐业之盛及对城市商贸的带动作用。明初瞿祐《长芦》诗有“万灶青烟皆煮海”<sup>[2](P200)</sup>, 清沈廷文《顾诗城谭视盐长芦》诗有“万灶风翻海上霜”<sup>[2](P206)</sup>, 俱见证了沧州从事制盐业的灶户之多, 形象描绘了盐业生产的盛况, 可谓异曲同工; 不仅是生产, 从事盐业交易的市场也很热闹: “贾客千家盐市闹, 道人两岸踏歌闻”(万士和《沧州道中》)<sup>[2](P152)</sup>, 明嘉靖年间曾任长芦盐运使的陈尧《登南川

楼》诗云“舟楫通津路，鱼盐趁市人”<sup>[2] (P117)</sup>，“趁市”即赶集，沧州集市自以鱼盐产品为特色；明人谢肇淛《早至长芦》“估客鱼盐千里舶，美人歌舞万家楼”<sup>[2] (P205)</sup>，提到鱼盐、运输之利，还透露出因商品经济发达而处处笙歌、服务业繁荣的状况；城中有盐市，还有零售的小盐商推车走村串乡去卖：“望里盐车重，村边酒幔垂。”（清谢重辉《长芦》）<sup>[2] (P206)</sup>

由于以上种种，海盐成了沧州标志性的产业，“地足鱼盐利，城依云水乡”成了人们对沧州的一般印象，但凡有人到沧州任职，其同僚好友的送行唱和中，也就常常把沧州和海盐生产联系起来。明宁波人包大中赴任沧州知州，其同乡、著名藏书楼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在《送包庸之赴长芦》诗中寄语包氏“他年论煮海，不愧古人筹”<sup>[2] (P204)</sup>，“煮海”即海盐生产之代称，如唐陆贽《议减盐价诏》“专煮海之利，以为贍国之术”<sup>[3]</sup>，故此处“论煮海”是勉励对方筹谋富国之计；著名文学家李攀龙《送包大中长芦知事》也提到“相将牛酒劳从事，未少鱼盐给俸钱”<sup>[2] (P204)</sup>，盖谓有鱼盐之利的富饶之地，不用担忧薪俸无着。

另外有一些诗歌反映出官方严厉查禁民间贩卖私盐的情况。明制，凡制盐的一切生产资料统归国有，灶户只负责生产，并无处置产品之权。万历二十九年（1601），直隶巡按吴达可在上奏的条陈中说：“国初之制，每场设立官坨，绕以墙垣，建有厅室，灶户所晒煎之盐尽入坨中。坨以内曰官盐，坨以外曰私盐。近来，官坨制度废，往往为奸民奸灶所侵占，宜查复官坨以绝私贩。”（《明神宗实录》卷358）<sup>[1] (P394)</sup>

这反映出明代后期官坨制度的逐渐废弛，官营盐业逐渐私营化的趋势。诗人们在沧州的亲历亲见，反映出民间私自运销牟利和官府严厉查禁的努力，如明人龚用卿有《沧州道中》：“草屋村氓惯负盐，芦围蒲橐满闾阎。小舟撑入长河里，纵有巡兵更不嫌。”<sup>[2] (P149)</sup>

作者为嘉靖五年（1526）状元，卒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早于吴达可所说官坨废弛的时代，然诗中可见产盐区百姓家藏私盐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运盐的小舟进入运河，纵有官兵巡逻也无法禁绝。明万历年间人王穉登夜泊沧州一带某处乡村，

也看到“绿树孤村夜逻严，家家尽卖水晶盐”的类似场景<sup>[2] (P154)</sup>。

反映盐户生活疾苦最为深入的是明弘治六年（1493）进士、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顾清五言古诗《送宗都运廷威之长芦》<sup>[2] (P203)</sup>，诗中详述作者在家乡所目睹东南盐户之艰辛，以及盐业管理之深重积弊，并且认为“北南虽殊风，物久理同盪”，希望宗都运（“都运”为“都转盐运使”之省称，明代为正三品，掌盐的生产、运输等事）到任后能够体贴盐户疾苦，不负民望，有所振作。顾清生活在明前期，其时官坨制度看来尚能较为严格地执行，从诗中反映出的盐户的窘迫的生存状况，可以看出后来官坨制度何以必然走向崩坏，何以在官府的严厉查禁下依然出现了民间贩运私盐的状况：

我家东海居，目击嵯丁苦。民劳莫如农，衣食自王土。输官赢斗升，小大得濡煦。溟沙列万灶，勺合尽官府。肩箱入连仓，私鬻翦为虏。燎薪与募直，一一挂文簿……<sup>[2] (P203)</sup>

以上对比盐户与农民的生活，认为农民虽然劳苦，缴纳公粮之后尚能养活一家老小，而盐户所产悉数上缴，私自售盐将受到严惩，等于生产资料完全归国家所有，劳动报酬也完全从官府取得，这实际上深刻指出了农民和盐户在经济上的本质差别：前者是拥有少量土地的小资产所有者，而盐户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因而盐户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接着，该诗进而指出了盐户管理政策的矛盾之处，在盐业税收不足之时，竟还要这些完全没有自由收入的盐户负责出钱补贴：

商课或不充，输钱为市补。缙緼非天坠，贸易复何所。不应为法初，乃尔自相梧。<sup>[2] (P203)</sup>

盐户纯靠劳动收入维生，辛勤工作，苦苦挣扎，却不得不在弊政的压迫下借高利贷，遭受兼并之徒的压榨盘剥：

公私两煎迫，称贷日旁午。穷年困炎歊，肉尽继肝膂。坐令兼并徒，旦暮收拾伍。<sup>[2] (P203)</sup>

对此，作者认为积弊太深，犹如“鱼烂不可举”一般难以收拾，“常思桑孔意，宁料遽如许”，不知道理财能臣的兴国之策，何以迅速变成了盐户群体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并对宗都运寄予“重为整机

杼”的厚望。在这首诗中，作者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寄寓在对盐户生存境况的真实观察和思考之上，无疑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特色。

## 二、沧酒

酿酒业是古代社会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明清时期，沧酒是河北大运河沿线地区的一大特色产品，以清冽著称，有全国声誉，加之诗与酒的特殊密切关系，明清大运河诗歌对驰名远近的沧酒有密集反映，堪称一个颇为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

雍正《畿辅通志》卷五十七引北宋赵珣《熙宁酒课》记载各地酿酒业课税规模，其中“十万贯以上，沧州二十三务”<sup>[4]</sup>，遥遥领先于河北其他各州，可见沧州酿酒业规模北宋时已相当可观，惟名声还没有后来大。万历《沧州志》卷三“土产”云，“（本地产）醋酱稍佳，而沧酒则有声于远近”<sup>[5]</sup>；明万历、天启年间人顾起元论其平生所饮各地名酒，或“多色味冠绝者”，或“品在中下”，或“间有佳者”，其中“沧州之沧酒”列在第一等“多色味冠绝者”<sup>[6]</sup>。由以上可知，沧酒之始享盛名，不晚于明万历年间。《河北经济史》则云，沧酒“著名始于明末”<sup>[1] (P398)</sup>。

“沧酒”之名首见于大运河诗歌正是在明末。明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后官至兵部尚书的熊明遇（1580—1649）有《沧州沽酒》：

南皮称胜地，沧酒复陶真。月下青帘夜，风前白堕春。自宽频独酌，求醉反劳神。杯影乾坤狭，悠悠何处论？<sup>[2] (P157)</sup>

诗写月夜独酌，落寞低沉之心绪，连喝酒都难以排遣。作者开篇点明作诗的地点，选取“沧酒”和说唱艺术（南人所谓“陶真”，在北地实应为各类大鼓书之前身）作为其沧州印象的典型代表，有力说明了沧州作为“名酒之乡”和“曲艺之乡”的确由来已久，而沧酒的名声鹊起和曲艺之盛行，均与大运河漕运的兴盛及漕运带动下的商业繁荣有密切关系，均得益于大运河带来的交通便利、客商凑集以及过往文人墨客的歌咏传扬。

比熊明遇稍晚的著名诗人钱谦益（1582—1664）有《沧酒歌怀稼轩给事兼呈孟阳》：

君初别我新折柳，归帆约载长芦酒。今我南还

又早秋，也沽沧酒下沧洲。轻舟一叶三千里，长瓶短瓮压两头。与君去国如去燕，一水差池不相见。沧洲芦花如雪披，沧水东流无尽期。沧州好酒泻盏白，照见行人鬓上丝。东皋秋清月舒彩，西湖采莲歌欸乃。期君开怀酌沧酒，醉拉程生戏墨海。<sup>[2] (P157)</sup>

钱牧斋生平跨明清两朝，但此诗与前引熊明遇诗同样作于明末而非清初。钱诗写给瞿式耜（稼轩）和程嘉燧（孟阳），明朝灭亡后，瞿式耜一直在南方抗清，程嘉燧则逝于清军入关前的崇祯十六年（1643），牧斋作此诗时孟阳尚在而稼轩则乘舟从运河返回南方不久。沧酒是诗中大放异彩的主角，瞿式耜南归时牧斋就曾与之相约路过沧州不可错过，牧斋自己南归路过沧州又长瓶短瓮装满了船头，并自叹在进京出京、宦海沉浮间华年渐老，所幸还可以在泊船沧州时痛饮名酒，以纾解人生苦短之慨、乡国亲友之思，而且痛饮之后还要载酒中流，期与家乡故友开怀同饮。

到清康熙、雍正年间，大运河上过往的文人墨客已普遍用“沧酒”“长芦酒”“麻姑酒”等具有品牌意义的称谓来称呼沧州所产美酒。翻检从明清诗集、方志中辑录出的运河诗歌，结合电子古籍资源检索，共得咏及沧酒诗歌44首，从作者生活年代来看，康熙、雍正两朝有16首，乾嘉时期则更是多达19首，沧酒在清代鼎盛时期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此类诗篇一方面足以印证沧酒已乘着运河的航船上京师、下江南，进入当时最负盛名的天下名酒之列，另一方面，诗歌自身也构成了一道饶有兴味的人文画卷：

南来北往的诗人们船过沧州，总会条件反射一般“想得醇醪领真味”，有人公务繁忙不及靠岸，不免要“望城徒觉口涎流”。（阔普通武《沧州城外思酒》）<sup>[2] (P194)</sup>有人还没到沧州就已经在酝酿着一场大醉：“麻姑城近不可到，江草日日颠风吹……垆头沧酒何日买，拟似长鲸吞漏卮。”（伊朝栋《沧州舟中阻风》）<sup>[2] (P183)</sup>

到沧州而思饮酒，是因为“此间有名酒，不饮奈公何”（崔旭《沧州晚眺》）<sup>[2] (P187)</sup>，不喝酒感觉对不住这座“酒城”；更是因为旅途寂寞，人生飘零，喝酒可以解忧：“但须沽取麻姑酒，他乡一醉偏忘

愁。”（顾宗泰《沧州》）<sup>[2] (P186)</sup>可是也有人像前文引述的明末熊明遇诗中一样，愁城太重，美酒都化解不开，如“河豚入市思拼命，沧酒盈樽不遣愁”（董元度《天津杂诗》），“瀛州未解三生恨，沧酒难消万斛愁”（李调元《登沧州朗吟楼》）<sup>[2] (P127)</sup>。

饮沧酒者，最从容潇洒的自然是当地友人迎上运河畔的酒肆、名楼，一起喝个痛快，沈兆沅《沧州喜晤王一樵》“惠我麻姑家酿美，朗吟楼畔遇诗人”，《卫河杂咏之二》“沧州有酒号麻姑，薄醉朝朝罄玉壶”<sup>[2] (P189)</sup>；李崢瑞《登沧州城楼》“沧酒知名久，飘零且一杯”<sup>[2] (P173)</sup>；也有人简便从事，泊舟河浒，在船内看着河景小酌：“扁舟河浒试闲论，更酌麻姑酒一樽……极目云天渺无际，半轮新月映波痕。”（庄景涑《舟次沧州怀古二首》）<sup>[2] (P176)</sup>在当地喝酒意犹未尽，有人沽酒在船，带到旅途上喝，“一瓮麻姑陈酿，向吟边细酌，共醉鸟篷。”（查礼《八声甘州·沧州舟中与贡木先生话旧》）<sup>[2] (P180)</sup>也有人像钱牧斋一样买回家喝，如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其《过沧州购得五年陈酿二瓶》（其二）有“归时赢得夸人处，一醉何须向妇谋”<sup>[2] (P183)</sup>之句，画家回到扬州之后，在文朋画友前炫耀其所携沧酒的喜悦神态已跃然纸上。

运河的交通之利和商业繁荣，使清代人在沧州以外也可以有幸品尝到沧酒。著名诗人查慎行《顾侠君庶常招饮晚翠阁，次东坡白鹤峰新居将成夜过翟秀才二首韵》记其在长洲（即今苏州）人“酒帝”顾嗣立家饮沧酒：“沧州酒醪南烹洁，每到君家醉饱还”<sup>[7]</sup>；清初大诗人朱彝尊有《高博士（恒懋）席上留赠公子（缉睿）二首》，筵席之间见“沧酒瓷罍满”<sup>[8]</sup>，高氏父子为天津静海人，由此诗在《曝书亭集》的编次看，当为康熙三年朱彝尊赴云中（今山西大同）投曹溶途经天津时所作。另外几首作于沧州之外的诗作则涉及了沧酒与天下其他名酒的比较，对沧酒褒奖有加，如赵执信《陈傅岩宅饮沧酒二首》（其二）云：

香归澹漠色归空，吴越甜浓拜下风。借问当筵赏心侣，何如北士到南中？<sup>[9]</sup>

诗人谓吴越之酒甜浓，比不上沧酒，然后顺便打了个比方，请问座中几位好朋友，沧酒像不像一

位北方士人来到了南方？赵氏本人是益都（今山东青州）人，亦属“北士到南中”，故此处以酒喻人，语涉诙谐。

再如与赵翼、袁枚并称“乾隆三大家”的蒋士铨有长达430字的五古《谢吴百药肇元侍读饷沧酒》毫无保留地盛赞沧酒罕有其匹：

……泱泱沧州水，淶淶波沧漪。土人汲而酿，五齐六法施。湛炽器复良，滴滴珠槽滋。品居通介间，弗教弗诡随。清冽异刚愎，和易难狎嬉。沫雪愧庸劣，汾潞惭险巇。羊羔浊乃俗，罗酒怯且羸……

蒋氏把沧酒人格化，谓其在圆融与耿介之间，刚柔相济，恰到好处，认为后面列出的涑酒、雪酒、汾酒、潞酒、羊羔酒、罗酒各有缺陷，皆不及沧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沧酒的酿造方法还远传到外地，造福一方百姓。乾嘉时期的学者邢澍（1759-1823）的《沧州》诗提到一位叫王谦的人，曾在邢澍的家乡阶州（今甘肃陇南武都区）任知州，把沧酒的酿造工艺引进到了阶州，邢澍怀着崇敬和感激，在沧州寻觅王谦的遗迹：

昔者王使君，剖符来吾州。遂传沧酒法，名与循绩留。今我过公里，岁星感四周。未识张赵后，遗泽犹存否？华屋渺何处，名就不可求。谁指原氏阡，再拜瞻松楸。<sup>[2] (P187)</sup>

清中后期，漕运弊端日益严重，道光五年（1825）、道光二十七年（1847）两次试行海运效果显著，之后海运渐渐成为漕粮北运的主要方式，大运河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使命渐告终结。随着运河漕运的废止，沿运城市地位的衰落，在运河文化史以及中国酒文化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沧酒也渐渐风光不再了。从道光元年（1820）至清朝灭亡的近百年中，直接咏及沧酒的运河诗歌仅检得7首，其中还包括徐世昌等由清入民国的作者之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沧酒的衰落。

在声名远播的黄酒走向式微以后，拥有悠久酿酒历史的沧州转而出产烧酒，并维持了相当长的兴盛局面。据民国《沧县志》：“黄酒：黏黍酿者世称为沧酒，纪昀《滦阳续录》载‘沧州酒，阮亭先生谓之麻姑酒’，盖言昔时旧家所酿度阁至十年外者，故其味压倒江南老花雕云……烧酒：以梁合麦麴酿

之，为本境大宗出品，邻邑多饮之者，岁产约五十余万斤。”<sup>[10]</sup>不过，烧酒生产在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也继续衰落，民国《河北通志稿》“食货志”载有沧县在1932年至1934年三年的酒业作坊统计表，数据显示造酒业快速萎缩，造酒作坊在1932年还有10家，到1934年就仅剩5家了<sup>[11]</sup>。

### 三、粮食作物和林果

作于大运河河北段的诗歌，在对运河两岸农村田园风光的描写中，诗人们吟咏最多的农作物是小麦，最常见的林果是桃和枣，普通树木则以柳、杨、槐等为多，其他如田野里的高粱、苜蓿，果品里的梨、杜梨等，也时而出现在诗人的笔下。这些诗歌中带有典型性的植物意象，与历史上河北沿运地区农林产业的分布特点是契合的。

明代时，北方种植面积最广的粮食作物是小麦，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粒》云：“四海之内，燕秦晋豫齐鲁诸道，烝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粱仅居半。”<sup>[12]</sup>就河北平原的情况而言，从《明会典》所载洪武、弘治与万历三朝的田赋额看，广平府和河间府南部州县的麦作生产尤占重要地位，这两府夏税麦的征收数已占到直隶全省总数的45.7%<sup>[13]</sup>。这一史实反映在运河诗歌中，就是咏到小麦的诗句特别多，可以说，绿油油的麦田，成了运河的航船上过往的诗人们对河北沿运地区的突出印象，由南向北，略举数例。

渡口驿（在今河北清河、故城与山东夏津三县交界）：

旷野麦苗才尺许，只见风来不见雨。（明 吴宽《渡口驿阻风》）<sup>[14]</sup>

安陵（安陵今隔大运河分属景县、吴桥，唐时为县，李白访安陵道士并接受盖寰为其所造道篆，平原太守颜真卿访安陵处士张镐，即此）<sup>[15]</sup>：

昔日安陵地，茫茫麦秀间。（清 谢重辉《安陵》）<sup>[2] (P24)</sup>

东光：

槐荫遥驻马，麦浪近迎人。（明 李呈祥《闰四月五日由东光至乐陵西村》）<sup>[2] (P52)</sup>

麦田春雨润，柳岸晓风清。（清 李调元《晓过

东光县》）<sup>[2] (P57)</sup>

薛家窝（在今河北南皮）：

春风吹麦秀，一棹逐渔蓑。（明 谢重辉《薛家窝》）<sup>[2] (P90)</sup>

沧州：

帆带斜阳飞树顶，麦翻细浪出花间。（清 张宝瑜《初夏游佟园偶作》，按：佟家花园曾为沧州名园，后废为村庄，在城南里许。）<sup>[2] (P113)</sup>

宿麦暗抽添绣陇，平林似剪护遥堤。（清 杜翰《沧州遇雨》）<sup>[2] (P191)</sup>

马头麦浪绿初齐，山鸟频呼滑滑泥。（清 刘曰萼《沧州城北道中》）<sup>[2] (P193)</sup>

平畴麦秀当轩绕，远树莺啼隔户传。（清 田茂遇《登朗吟楼和卜臣韵》）<sup>[2] (P125)</sup>

青县：

小村火炙榴方赤，长甸风催麦欲黄。（清 傅宸《青县道中即事》）<sup>[2] (P256)</sup>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小麦已成这一地区农田里的主角，但由于地势低洼，水患频仍，河间府北部特别是沧州以北，大片土地的盐碱化也给诗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明徐中行《九日登芦台》“孤城摇落气悲哉，斥卤黄花也自开”<sup>[1] (P153)</sup>，周天佐《沧州会王知府》“沧瀛野水滨，泊舟遇故人。为言皆卤地，可惜此疲民”<sup>[2] (P152)</sup>，清李钧《督粮舟次沧州》“万顷芦花生积卤”<sup>[2] (P189)</sup>，彭元瑞《沧州》“莫嫌胠篋甚，斥卤地多荒”<sup>[2] (P183)</sup>等诗句，都记述了这一带土地盐碱化的现实，有的还对当地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以上可知，“斥卤之地”早已是人们对于沧州一带的固有印象，因此元初大儒郝经舟行过沧州时还写下了“斥卤谁知草木蕃，桑连平野麦连村”<sup>[2] (P198)</sup>，对在这一带见到茂盛的草木和广阔的麦田颇感惊讶。

相对于庄稼，果木树受水患和土地盐碱化的影响要小一些，农民靠种植果木增加收入，在凶年还可赖之果腹。明代河间府所属各县，农家以种桃为盛，加之桃花观赏价值高，最易入诗，运河诗歌中咏桃花的篇章特别多，在沧州一带，似乎不少河段的运河两岸大堤之上或近旁就植有桃林，给很多水上行旅之人留下了“桃花一路红”的美好印象。

寒食节，运河两岸已被争奇斗艳的桃花杏花染红：“曲曲江村桃杏红，楼船南下信春风。”（明林命《寒食连窝舟中》）<sup>[2] (P36)</sup>连窝，今名连镇，运河两岸分属景县、东光。

明人朱方《泊头》诗有“桃方种就木看成”<sup>[2] (P69)</sup>，写出了桃树生长较快、结果早的特点，北方农谚云“桃三杏四梨五年”也可以为证。清初周茂源《次泊头》有“地有新田栽苜蓿，人无故老种桃花”<sup>[2] (P72)</sup>，著名诗人查慎行也有《泊头镇看杏花》诗，可见桃杏也是泊头春天的典型画面。（另按，周茂源诗提到的苜蓿，耐盐碱和干旱，既是优质牧草，又可用作改良土壤或堤坝上的护坡植物，故曾在运河沿线广为种植，明人王问《泊武城县》诗有“孤城日出人烟少，远戍秋深苜蓿平”，明武城县城跨大运河两岸，河西部分今为河北故城建国镇。）

沧州以南捷地运河上建有减水闸，乾隆皇帝及扈从群臣都有诗作，捷地减河畔建小亭，植桃花甚盛，曾任直隶总督的方观承在其地有诗《泊舟步至移兴寺看桃花即事》。

连窝、泊头、捷地，一路向北，到沧州城内外，有“桃花锦岸自回转”（明夏鍈《沧州路》）<sup>[2] (P144)</sup>，“树底小桃花，傍人篱外斜”（清王增年《菩萨蛮·沧州道中》）<sup>[2] (P192)</sup>，下雨天则见“桃花红湿胭脂雨，杨柳青含翡翠烟”（清贾继曾《春霁郊游过南川楼旧址》）<sup>[2] (P121)</sup>，诗人们感叹桃花开早，春寒料峭时已经盛开：“翠袖寒如此，桃花艳不销”（清陆继辂《沧州道中周二济同作》）<sup>[2] (P188)</sup>，同桃花一样早的还有勤劳的农人：“三月天犹雪，芳尘草未生……雨餘桃柳放，已有桔槔鸣”（清阮亨《过沧州作》）<sup>[2] (P188)</sup>，刚刚有些春意，已经有人开始汲水灌溉。

沧州以北，运河畔仍有桃花相送，清人钱梓林《春日登峭帆亭》有“夹岸桃花曲径通”<sup>[2] (P276)</sup>，峭帆亭在青县；吴雯《次青县题壁》诗云：“当门九曲昆仑水，千点桃花尺半鱼。”<sup>[2] (P260)</sup>后者在当时颇受称赏，王士禛《渔洋诗话》、沈德潜《清诗别裁集》都曾引述。

大运河河北段沿线更有地域特色的果木是枣树。河北的枣树栽培史很早，战国时苏秦游说燕文侯就提到燕国有枣栗之利，清代大学者纪昀在《阅

微草堂笔记》卷十三《槐西杂志三》也曾提到其家乡献县崔庄（今属沧县）枣树“动辄成林，俗谓之枣行”，又说“余乡产枣，北以车运供京师，南随漕舶以贩鬻于诸省，土人多以为恒业”<sup>[16]</sup>，各地方志中记载更为普遍，至今枣仍是沧州一带的特产。运河诗歌写到枣的篇章，从路边朴素的枣花，到枣收获的晾晒、运输，直到当地人用枣来招待来客，无不涉及。

写枣花如明李先芳《于沧州往泊头舟中同王武库作》：“蚕月始条桑，枣花亦纂纂”<sup>[2] (P151)</sup>，清刘大观《晚泊沧州》：“蝉噪水边树，枣开村后花”<sup>[2] (P186)</sup>，清初顾景星《流河》：“夹河芳草色，沿岸枣花香”<sup>[2] (P289)</sup>，流河驿在青县，即将出沧州而入天津境。清初周亮工《长芦与叶子尚》：“水阔长芦岸，风高晒枣天”<sup>[2] (P206)</sup>，写枣之晾晒，《泊头》：“疆口珠梅闸，泊头红枣船”<sup>[2] (P71)</sup>，写枣之外运，正是纪昀所谓“南随漕舶以贩鬻于诸省”者。明瞿祐《青县》：“饌设河鱼白，筵供野枣红”<sup>[2] (P247)</sup>，则是红枣被摆上了招待客人的筵席。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云：“好梨多产于北土。”<sup>[17]</sup>枣之外，梨也是大运河河北沿线地区的特产，万历《沧州志》卷三“土产”云其地水果“梨枣为最饶”。就河间府而论，最出名的梨在交河（今属沧州），时称“交梨”，即今所谓“泊头鸭梨”，但明清运河诗歌所见咏梨或梨花的诗句多作于泊头以南与之毗邻的东光县。如郑梁《晓泊东光》“觅枣寻梨随药下，长安此去不多程”<sup>[2] (P53)</sup>，明末清初人彭孙贻还有一首五律《东光梨》：“东光仙更好，坐啖满林青”，又说“澄鲜生玉腑，缥缈望金茎”<sup>[2] (P51)</sup>，诗人笔下的东光梨堪比仙果。另外，杜梨在这一带也很常见，杜梨果小味涩，但可以嫁接梨树，开花也和梨花相似，吴之镇《重过连儿窝次去年题壁韵怀自牧》“飏风桃李枝枝雪，笼日棠梨树树烟”<sup>[2] (P38)</sup>中的“棠梨”即是。

从明清大运河河北段的诗歌中咏及果木的诗篇的分布看，运河沿线地区的梨枣之利，主要在东光以北至沧州间的几个县较为突出，这和今天著名的沧州小枣、泊头鸭梨的产地分布也是一致的。东光以南，确乎没有北部多，民国《景县志》卷二“物

产”所说景县的情况或有一定代表性：“枣……惟邑人种者多在院落中，于村外成行种者不甚多也”；“桃……邑人多不种之”；“梨……邑内梨产多在北半”<sup>[18]</sup>。究其原因，可能与河间府南部土地的盐碱化较轻，更宜于庄稼生长，人们对果木的依赖和投入减少有关。

综上所述，大运河诗歌对沿线田园风物的描写，构成一道流动的画卷，呈现了明清数百年间河北东部农村的真实风貌。这其中，如果说杨、柳、桃花之类植物意象在古代诗歌中俯拾可见，那么，密集出现的麦田、枣花、梨花等应该说具有较为鲜明的地域特色，构成了有别于江南水乡等其他地域的朴实平淡的北方之美，这是大运河给予古典诗歌的馈赠，也是给沿线地区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 参考文献：

- [1]孟繁清.河北经济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王玉芳.我们的大运河·诗歌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

- [3](清)董诰.全唐文·卷四百六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清)李卫.畿辅通志·卷五十七[M].雍正刊本.  
[5](明)李梦熊.沧州志·卷三[M].万历刻本.  
[6](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M].万历刻本.  
[7]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四十[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赵执信.因园集·卷九[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李学谟.沧县志·卷十一[M].民国刻本.  
[11]王树枏.河北通志稿[M].民国刻本.  
[12](明)宋应星.天工开物[M].崇祯刻本.  
[13]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14]谢肇淛.北河纪余·卷三[M].万历刻本.  
[15]马吉照.河北唐诗地理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  
[16](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M].嘉庆刻本.  
[17](明)李时珍.本草纲目[M].万历刻本.  
[18]张汝漪.景县志[M].民国刻本.

### The produce and economy along the Hebei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reflected in the Canal poems

MA Ji-zhao<sup>1</sup>, WANG Feng-li<sup>2</sup>

(1. Basic Department, Qinhuangdao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Qinhuangdao, Hebei 066100, China; 2. 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51, China)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he unique literary value, poems about the Jing-Hang Grand Canal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irrored the daily life and social customs of those periods, offering valuabl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regional history along the Canal.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long the Hebei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wheat was the main crop; Jujube, peach, and pear were the most popular fruit trees; Changlu sal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product; Liquor distilled in Cangzhou gained tremendous popularity and was regarded as cultural legendry over the hundreds of years. The above-mentioned elements feature in the Canal poems and could be corroborated by historical records. The poems depic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anorama along the Hebei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in a more detailed and vivid way.

**Key Words:** Grand Canal; Canal Poetry; Cangzhou

**基金项目:** 河北传统文化研究项目“大运河与明清以来华北社会变迁研究”，编号：HB18WH02。

**作者简介:** 马吉照（1977-），男，河北景县人，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元明清文学、燕赵历史文化。

[责任编辑：张胜广]